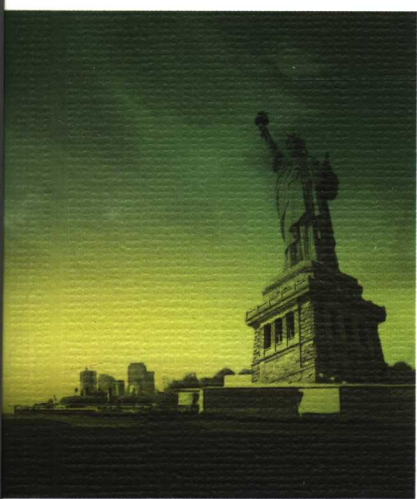




未名社科·译言堂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



走出纯真年代

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

〔新加坡〕纪梭·马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 著

李 韬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走出纯真年代

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

〔新加坡〕纪梭·马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 著

李 韬 译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24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加坡)马布巴尼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未名社科·译言堂)

ISBN 978-7-301-13488-7

I. 走… II. 马… III.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382 号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by Kishore Mahbubani

Copyright © 2005 by Kishore Mahbuba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

著作责任者: [新加坡]纪梭·马布巴尼 著 李 韬 译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488-7/D·20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6.875 印张 166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声 明

本书为新加坡外交官纪梭·马布巴尼所著,作者丰富的经历使他可以从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由于他所处的背景和立场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争议,我们译介出版的目的在于参考和借鉴,以期向读者展示更为全面和丰富的视角,而对于部分内容还需要读者进行甄别,其立场和观点均不代表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 序

在世界历史上,美国的出现是一大奇观。因为它只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就从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对这一“美国现象”,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与思考。

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赴美国考察。4年以后,他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问世就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仅法文版就出了17版,还有英、德、俄、荷兰、匈牙利、意大利、丹麦、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日本明治维新后,这本书也很快被翻译介绍。《论美国的民主》主要是总结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美国的立国与它的发展的确是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段加速和升华。

1888年,另一位欧洲人也对美国进行了考

察并写就《美国旅行印象》一文,他就是恩格斯。他这样写道:“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 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

托克维尔与恩格斯这两位欧洲思想家在实地考察美国时主要看到的是19世纪中期与中后期的美国实践。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后被称作“门罗主义”)时,是将美国与旧欧洲作一个切割。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重点还是发展自己。所以托克维尔与恩格斯所着力介绍的,还是美国本身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19世纪末的一场美西战争,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整个世界被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欧洲列强带进了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在自己内部的争争吵吵之中,竟在和西班牙的一场战争中成了赢家。可以这样说,美国是在对世界很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成为对世界越来越有影响的一员。世界时势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命运天定”。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与他们的宗教精神紧密相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舞台上的一个主角。它有许多创意,也将其中一些变成了现实。踌躇满志的美国人要继续“一往无前”。待到与前苏联的冷战结束,美国人的自信达到了顶点。“9·11”悲剧的发

生,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

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个大课题。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马布巴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走出纯真年代》一书,就是他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思考的结果。此书用英文写就,在美国出版,并引起了美国知识界和企业界一批精英人士的重视。在亚洲人士中,能做成这样一件事的人还并不多。

对于正在全力投入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了解乃至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中美交往的日益深入,中国人用美国人能倾听的话语来阐述世界的著作也必然会出现。对此,我们要有自信。在中国人的传统精神资源中,包容是一种很独特的品格。中国人看美国,不是局限地看,而是要了解整个世界并思考人类的未来。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在夏威夷写下如下文字:“余乡人也,9岁后始游他县,17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旧语新说,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到启示。

袁 明

2008年3月8日

献给安妮

致 谢

2002年5月31日是新加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的最后一天,作为时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大使,我有必要举办一个招待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那天的最后一个会议结束后,我不得不请我的副手代替我来主持这个招待会了。我必须赶快去机场飞回新加坡,因为我得知父亲病危。当我回到新加坡、急忙赶到医院时,父亲还一息尚存。他急促地呼吸着,已经说不出话来。我坐在他的病床边,抓住他的手安慰他,也让他知道我回来了。我问自己:假如当我处在他的这种状态,我会有什么想法?看着父亲离我而去,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个念头跃入我的脑海: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是否把我要写的东西都已写了下来?几个小时之后,父亲平静地走了。但在我伴在他身边的这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发誓把我几年来计划要写



的书全部写出来。我希望本书成为父亲去世时我因反省而得到灵感准备要写的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

父亲的辞世提醒了我,我们所写的东西在我们去世以后就无法再修改了。父亲的辞世还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应当写下那些我真正想说的话而不是那些取悦时下读者的东西。在写作本书时我尽可能坚守这一信条。

没有什么学问可以单独完成。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世界各地所经历的对话与会议的成果。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感谢那些曾经给过我教诲的人。我希望我的朋友在读本书时能够回忆起我与他们所进行的对话。我有幸结识了一些美国密友,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那么多有关美国这一美好社会的信息。同样,如果没有我的国际经历,本书也无从写起。

我要感谢温迪(Wendy)和比尔·吕尔斯(Bill Luers)夫妇以及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是他们为我引荐了我的文学助手莫特·詹克洛(Mort Janklow)。正是莫特在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中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灵感,莫特还把我介绍给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我向该出版社提交了写作计划。我感谢本书的出版商,尤其是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和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普里德尔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给予我的支持。每一本书都需要有前期的研究做准备,我有幸得到两位好的研究助手,他们是梅雷迪思·安吉尔森(Meredith Angelson)和理查德·马斯(Richard Maass)。我的三位私人助手分别是金泳龙(Kim Jong Lung)、阿肖库马尔·奈尔(Ashokumar Nair)和谭吉琳(Jileen Tan)*,他们在我写作本书期间为我提

* 此处人名是音译。本书中的中文式人名除已有通用译名外皆为音译。以下同此。——译者

供了极大的帮助。本书的结稿和编辑加工是在具有传奇色彩的新加坡拉斐尔饭店内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的,这一饭店因住宿过众多的作家而闻名于世。

还有几位朋友在书稿完成后热情地审阅了书稿,他们是史蒂夫·伯恩斯(Steve Burns)、弗朗西斯·钟(Francis Chong)、洪云峰(Khong Yuen Foong)、安-佩特里·琼斯(An-Petley Jones)和布赖恩·索切克(Brian Soucek),他们的评论使我的手稿受益良多。乌梅基·辛格(Umej Singh)在“美国与伊斯兰”一章中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莱斯·盖尔布(Les Gelb)、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及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当我请他们对本书“吹捧”几句时,他们都迅速予以积极的回应。他们的认可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还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本书中大部分的知识都是我从1971年至2004年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的33年中获得的。我真诚地对新加坡外交部里我所有的朋友和同事说声谢谢,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全部教诲,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本书所有观点都是我个人的,它们并不反映新加坡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我一直真诚地对待我自己,而不是我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服务的这一机构。本书不代表一位外交人员的观点,我希望它所代表的是一位努力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学者的个人观点。

如果不是有了先母,我的家庭就不可能度过早年那些艰苦的岁月。她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我把自己脊梁骨中所有的刚性都归功于她。我把我的第一本书《亚洲人会思考吗?》奉献给了她,她的勇气和刚毅将永远激励

着我。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亏欠了我夫人安妮 (Anne) 多少。我要感谢她的耐心、编辑指导和才智。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和支持,我不可能写出本书。我很高兴把这本书奉献给她。

导 论

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愿意毫不迟疑地去面对他们那个时代其所领导下的民众的热切期望。这就是领导艺术的真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我有幸能长期深入地体验了美国社会。我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爱尔兰裔美国人。2003年的感恩节，安妮的娘家人聚集在我们纽约的家中，这已经是连续第六年这样做了。包括安妮的娘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三个孩子的十一位美国亲表兄弟姐妹在内，共计有三十八个人参加了这次聚会。每当我想起美国社会的那些优秀品质，我就会想到这些感恩节的夜晚。我认为，美国能在其民众间建立起如此温暖而又相互关爱的社区，它该是一个多

么神圣的社会。美国的个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大方,在其他社会的人群中间是罕有与之匹敌的。

我同样还有幸长期深入地体验了其他类型的社会。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之一大概就是我亲身经历了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席卷全球的很多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思潮。我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贫穷的家庭,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我生长在一个印度裔家庭里,左邻右舍住着的是穆斯林,而新加坡社会的主体是华人。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领悟到了西方的强势地位,这一强势地位影响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赞赏印度人、穆斯林和华人,他们加起来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我所生活的环境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立足点,使我得以由此来观察这个如此快速变化着的世界。

我成长的时代正是美国全球优势地位不断增强的时代,因而我还经历并懂得了美国对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尽管美国并没有刻意去这么做,但实际上它已经深入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美国领导人把美国说成是“山巅之城”,他们把美国看作是一种象征,一种从遥远的地方为人们提供精神鼓励的象征。然而,由美国带动的科技进步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本意义上的距离消失了。美国开始直接进入所有人的生活。

与其他美国专栏作家相比,《纽约时报》的汤姆·弗里德曼在向美国民众解释不断变化的世界方面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最多的,他曾试着用800个单词写下了一篇名为《万物之理》(A Theory of Everything)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写道:“一位巴基斯坦外交官曾对我说,美国的力量、文化和应如何组织社会的经济理念变得如此突出(这种突出地位因全球化而被放

大),以至于美国对我们这个地球上民众生活的影响开始‘超出了其政府的影响’。——是的,我们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超过了他们政府的影响。”^①

美国对 60 亿地球居民所做的远不止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已,它还主导着一个国际秩序。对于这一秩序,每个国家和地区除了遵从之外别无他途。美国做出决定,世界其他国家随之进行调整。我还没有遇到一位渴望主宰世界的美国人。这是一种优秀品质。不幸的是这一优秀品质被同样悲惨的现实冲销掉了,这一现实就是很少有美国人能明白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主宰着世界。这是造成国际误解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为改变世界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它却是为应对被自己所改变了的世界做准备工作做得最差的国家之一。

21 世纪的进程如何发展将取决于美国与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关系。美国历史上最初的两个世纪给世界带来的是希望。美国几乎一直都是一个温和的大国(大概只有在拉丁美洲例外)。美国通过其思想、价值观和管理体系征服了世界,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通过武力征服了世界。美国是“山巅之城”,其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经济增长。因而,所有美国人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可以为 21 世纪开出一个简单的处方,那就是让我们拥有更多相同的东西。

本书的目的是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听任旧有的思维模式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美国来说不是,对世界来说也不是。如果我们 21 世纪还在沿用 19 或 20

^① Thomas L. Friedman, "A Theory of Everything,"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03.

世纪的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麻烦之中。我们正步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必须自觉地摒弃旧的思维方式,并准备好新的思维路线图。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涉及未来40年,而不是未来4年。4年只是美国一届政府任期的时限。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既应该看到水面的泡沫,也应该体察到水下的潜流。而绝大多数的政客在多数时间里所关注的是泡沫。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连选连任,而不是为其选民的子孙操心。所以,对处理那些将根本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更深层次的潜流,存在着结构性偏见。

一个简单的现象可以说明美国通过怎样的戏剧性方式改变了世界。当全球化还没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时,人类分别乘坐在不同的航船上。我们有时候也会相互间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的命运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航船内部的力量。今天,全球化的结果是,我们不再分别乘坐不同的航船,我们全都乘坐在了同一条我们称之为“地球飞船”(Spaceship Earth)的航船上。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这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现状的真实描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发生在地球某一角落的事情几乎立刻就影响到地球的另一端。1997年7月肇始于泰国曼谷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和巴西传到美洲海岸。发生在中国南部一个村庄的“非典”(SARS)病毒传到香港,而后又几乎同时从香港传到地球的两端——新加坡和多伦多。美国侥幸躲过了“非典”。但是,对美国读者来说最好的例证是“9·11”事件,在阿富汗的一个偏僻村庄里策划的阴谋毁掉了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美国与阿富汗也航行在同一条船上。

这条船存在着一个根本性问题。众所周知,每条船都要有船长和船员来驾驭和管理整条船,然而“地球飞船”却没有这样的船长和船员。这条船上的确有一个超级大国做出影响整条船的决策,可它做出这些决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惠泽整条船:它首要关注的是乘坐头等舱——美国舱的那些人的利益。这一超级大国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其他乘客。但是,它做出的决策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到全体乘客5%的那些人的利益,因而“地球飞船”上其他95%的乘客就产生了怨恨情绪。在我前文提到的同一专栏中,汤姆·弗里德曼引述“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出版部主任纳扬·钱达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让世界把这种对美国的愤懑情绪发泄出来,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能投票决定美国的力量,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受其影响。”

这种愤懑情绪并非不可避免。直至最近,在地球上其他60亿居民中还存在着巨大的对美国的好感之源。这些好感之源是美国无意间积聚起来的,而不是有意为之。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些巨大的好感之源的存在。可悲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也未意识到在过去约十年的光景中这种好感之源在日渐干涸,取而代之的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某些角落里出现的对美国的憎恨与愤怒之源。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近期发生了两个涉及美国的全球性进程,而美国却对此没有太多关注。本书将着力说明发生了什么。

经历了历史上如此多的创伤:从内战到民权运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亚洲的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很多美国人仍不愿接受这样的观点:美国人至今还生活在纯真年代。尽管经历了如此创伤,美国人的心目中仍能保留着两个相互